



沂蒙精神山高水长

□ 赵新奇

沂蒙巍巍，如龙卧盘；沂沭泱泱，如带绵延。鲁中腹地，逶迤八百里沂蒙，枕泰山而襟楚水、拥鲁都而滨东海，不仅孕育了东夷文化、琅琊古郡的宏猷景象，涌现出宗圣曾子、兵圣孙武、书圣王羲之、智圣诸葛亮等鸿儒雄才，更曾作为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党领导下的一块时间较长、区域较广、人口众多的重要根据地，见证过一个风雨如晦、血火熔炼的战争年代，镌刻下一段党政军民生死与共、党群干群水乳交融的红色历史。孟夏之初，沂蒙七十二崮群峰环翠、百木竞秀，到孟良崮战役纪念馆、沂蒙红嫂纪念馆、八路军115师司令部旧址、刘少奇在山东纪念馆、华东革命烈士陵园、华东野战军纪念馆等地，重温峥嵘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体悟沂蒙精神，感怀至深。

我们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胸怀黎庶、救焚拯溺，在齐鲁大地山河飘摇、家园破碎的危难时刻毅然决定“派兵去山东”，感召和激发了沂蒙人民对党无限忠诚、对革命无私奉献的大义壮举。1938年4月，日军攻临沂城，制造了惨绝人寰的“临沂血案”，血性刚勇、不畏强暴的沂蒙人民奋起抗争、与敌血战。1938年9月，毛泽东运筹帷幄、着眼全局，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派兵去山东”。山东北通平津，南接江淮，东临渤海、黄海，并有黄河、泰山屏障，是连接华北、华东甚至沪杭地区的重要节点，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派兵去山东”，这是党中央早就酝酿着的战略思想。1938年5月，党中央派郭洪涛等政治军事干部赴鲁领导抗战；1939年3月，陈光、罗荣桓率八路军115师师部及主力入鲁；1939年6月，徐向前、朱瑞率八路军第1纵队挺进地处山东东南部的沂蒙地区。人民军队的到来极大鼓舞了山东人民、壮大了抗日力量，沂蒙大地涌现出众多抗日英雄和“抗日楷模村”。在莒南渊子崖保卫战中，村长林凡义带领全村312名自卫队员和村民，以土枪、土炮、礮头、石块等为武器，与1000多名全副武装的日军殊死搏斗，全村自卫队员和村民牺牲147人，区委书记刘新一、区长冯干三等40多名干部和战士壮烈捐躯，在八路军和区武工队驰援下，日军被

歼112人后仓皇逃窜，此战被毛泽东誉为“村自卫战的典范”。1941年11月，发生在沂蒙山根据地中心区的大青山突围战，是一次反日寇大“扫荡”的著名战斗。为了掩护群众撤离，300多名抗大一分校学员在打光全部子弹、手榴弹后，举起石头奋勇还击，第五大队二中队指导员程克壮烈牺牲，队长邱则民弹尽跳崖殉国。大青山突围战粉碎了日军“铁壁合围”，书写了“北有平型关、南有大青山”的英雄战例。自1937年至1945年，山东军民共击毙、击伤、俘虏日伪军25万多人。1941年初，山东根据地面积3600平方公里，人口1200万；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根据地面积拓展到12.5万平方公里，根据地面积拓展到12.5万平方公里，党员发展到20万人，主力部队扩充到27万人，民兵50万人，自卫队120万人，为夺取解放战争胜利积蓄了重要力量。回顾这段历史，正是因为为我们党自成立之初就把为人民谋利益、谋幸福、谋解放作为行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此出生入死、浴血奋战，才点燃了沂蒙人民为保家卫国、追求解放而战的燎原之火；正是因为有一大批坚持真理、不怕牺牲、心系人民的共产党人，才有了一大批坚定不移跟党走、跟党走走的人民群众；正是因为有了革命火种在沂蒙大地的播撒、承袭和弘扬，才为沂蒙精神注入了红色基因。

沂蒙人民用齐鲁儿女的忠肝义胆、坚毅刚烈，在人民军队浴血鏖战、矢尽粮空的艰难境地大义毁家纾难、倾力支援，为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提供了丰厚滋养。钟灵毓秀的沂蒙大地，赋予了生活在这里的人民忠诚、淳朴、刚毅的品格。在我们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感召下，沂蒙儿女以极大热情和崇高精神，积极拥政拥军、参军参战、奋勇支前，他们摊煎饼、做军鞋、送弹药、架人桥、抬担架，“用小米供养了革命，用小车把革命推过了长江”。当时，沂蒙根据地420万人，其中21.4万人参军参战，10.5万名革命烈士血洒疆场，120万人拥军支前，“沂蒙红嫂”明德英、“沂蒙母亲”王换于，“三英烈之父”刘永良，“沂蒙六姐妹”张玉梅、伊廷珍、杨桂英、伊淑英、冀贞兰、公方莲……他们已成为沂蒙精神永恒的红色坐标。解放战争时期，鲁南区遭

到国民党“还乡团”反攻倒算，90%的村庄被洗劫，14万名干部、群众被杀害，即便这样也没能动摇沂蒙人民坚定不移跟党走的决心。从大革命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25年间，在沂蒙山区境内战斗、工作而牺牲以及沂蒙山区在外地牺牲的烈士多达62576名，其中3万余名烈士为沂蒙籍。在他们当中，有在济南纬八路刑场英勇就义的刘晓浦、刘一梦叔侄，有在日寇“大扫荡”中壮烈牺牲的陈明、辛锐夫妇，有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的爱人陈若克和他们刚刚出生19天的女儿，也有汉斯·希伯这样的“外国八路”……走进华东革命烈士陵园，瞻仰45米高的五角灯塔式纪念碑，耳边仿佛响起了硝烟弥漫中隆隆的枪炮声和革命先烈奋勇杀敌的呐喊声；轻抚革命烈士纪念馆内巨大的石质联碑，6万多名革命烈士的不陨英魂和浩然之气仿佛扑面而来；驻足华东野战军纪念馆展示厅，八路军行军穿过的雨衣、沂蒙军民用过的大刀、儿童团员站岗放哨的红缨枪，仿佛正在诉说那个年代的血雨腥风。“你就是核心，你就是方向，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放”，这首诞生于烽火沂蒙的《跟着共产党走》，不正是人民群众“谁为人民的利益着想，谁就是人民心中的‘自己人’”的真实呼声吗？不正是党心、民心心心相印的生动写照吗？

在长达12年的革命斗争中，我们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为了人民利益出生入死、浴血奋战，沂蒙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舍生忘死、参军参战、奋勇支前，党政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共同铸就了沂蒙精神。“党群同心、军民情深、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军队在开辟和建设山东根据地的过程中同沂蒙人民共同铸就的。沂蒙精神充分体现了党、人民军队同人民的鱼水之情和血肉联系。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2013年1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华东革命烈士陵园，向革命烈士纪念馆敬献花篮，参观沂蒙精神展，深情地说：“我一来到这里就想起了革命战争年代可歌可泣的峥嵘岁月。在沂蒙这片红色土地上，诞生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儿女，沂蒙六姐妹、沂蒙母亲、沂蒙红

嫂的事迹十分感人。沂蒙精神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而今，那段峥嵘岁月已逝去了70多年，而那段峥嵘岁月中集中迸发出的沂蒙精神，却以其超越时空的强大力量和永恒价值告诉我们：那是一种坚定不移的信念，那是一种敢于斗争的精神，那是一种水乳交融的情怀，那是一种舍生忘死的担当，那是一种薪火不灭的传承……

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扬光大沂蒙精神，必须以新的境界把握沂蒙精神的本质，以新的担当践行沂蒙精神的要求，自觉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沂蒙精神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在新时代学习弘扬沂蒙精神提供了根本遵循。发扬光大沂蒙精神，必须自觉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深刻把握理想信念和初心使命的时代要求，在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上持续努力；必须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善于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分析、解决问题，不断提高把握潮流大势、应对风险挑战、推动改革发展、造福人民群众的本领；必须大力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践行“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必须把远大理想与现实任务结合起来，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只有这样，“党群同心、军民情深、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才会极大地弘扬，人民坚定不移跟党走的磅礴伟力才会极大地汇聚。而弘扬这样的精神、汇聚起这样的力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必然会实现。

红色记忆

盛夏蝉鸣

□ 张鑫

蝉是专属于炎热烈天的歌手，是高温下不知疲倦的乐师。印象中，蝉似乎永远也不怕炎热，仿佛温度越高它们叫得越来劲。聒噪的蝉鸣声响起，就标志着难耐的酷暑到了。

捕捉知了是农村孩子们非常重要的童年游戏。蝉的幼虫阶段在泥土中度过，它们会在土地上打出一个个拇指粗细的洞。发现这些洞后，孩子们的乐趣就来临了。他们用塑料瓶灌满水，将水倒在这土洞里，水咕嘟咕嘟地往下灌，不一会儿这洞里就会爬出来一只黄褐色的幼蝉。小时候，我也经常和伙伴们一起玩“引蝉出洞”的游戏。但是捉到幼蝉后，往往玩一会儿就把它放了，因为大家享受的不过是这寻找幼蝉的过程。

父亲曾绘声绘色地给我讲起他小时候捕蝉的故事。他和小伙伴们从废弃的窗纱上抽出一根纱线，将其做成一个活的绳结，绳结的控制线绑在长长的竹棍上，这种自制的加长捕蝉工具能够捉到树枝高处的蝉。循着蝉鸣声蹑手蹑脚地靠近，小心翼翼举起竹棍，用活的绳结接近蝉身。等蝉的身子进入绳圈之后，猛地拉动绳结的控制线，把蝉紧紧套在绳结里，这样就成功了。当然，有的蝉比较机敏，它们会察觉到有什么东西正在向自己靠近，便会迅速地飞逃离，而那些反应稍微迟钝的蝉就会落入圈套，成为捕蝉者的战利品。《庄子》里面也讲过



句倏承蜩的故事，可见捕蝉这件事还真是历史悠久。

对于小时候的我来说，捉知了就跟逮麻雀、捉青蛙、捞鱼儿等其他好玩的游戏没什么区别，等长大读书了，才了解到很多关于蝉的知识。在古代，蝉的雅称有螳螂、蜩、蜋、蜩、蜩、蜩等。蝉以吸食树的汁液为食，一般不会吃其他动植物。雄蝉腹部会有发音器，能连续不断发出尖锐的声音。蝉的成长过程非常不易，它们在若虫阶段，要经过两三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在地下蛻皮四次。成熟

的若虫爬出洞穴后，慢慢爬上树干，然后自头胸裂开。不久，成虫爬出蝉壳，羽化过程需要1—3个小时。

蝉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自古以来，人们对蝉的鸣叫最感兴趣。诗人墨客往往借歌咏蝉鸣来抒发自己的高洁情怀。清人沈德潜之《唐诗别裁》中说：“咏蝉者每咏其声，此独尊其品格。”由于蝉栖于高枝，风餐露宿，不食人间烟火，其所喻之人品属于清高一型。骆宾王《在狱咏蝉》诗中的“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李商隐《蝉》诗

中的“本以高难饱”“我亦举家清”，王沂孙《齐天乐·蝉》词中的“甚独抱清高，顿成凄楚”，虞世南《蝉》诗中的“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等诗句，都是用蝉来喻指高洁的人品。从百花齐放的初夏到绿叶凋零的秋天，蝉一直不知疲倦地用轻快而舒畅的调子为大自然增添浓厚的情意，无怪乎人们称它为“昆虫音乐家”“大自然的歌手”。

在中国花鸟画中，蝉的身影也随处可见。清代画家黄慎画蝉，先用淡墨画出头部和口器，再用焦墨点出头部的凸起，并简单勾出蝉足。用淡墨轻着纸，勾写蝉翅，然后以淡赭色略为扫抹，一只蝉的描绘即告完成。头部的坚实质密和蝉翅的透明轻薄跃然纸上，极为立体和真实，又饶有笔墨意趣。这些蝉画深为很多怀抱重真人士喜爱。

响亮的蝉鸣与盛夏时节、美丽的故乡、美好的童年早已成为不可分割的一体。又是一年盛夏时，蝉声再次响起，思维随着蝉声起舞，心中满是和鸣蝉有关的欢喜。



《三国演义》的开篇词《临江仙》，可谓家喻户晓、千古流传。这首词的作者是被誉为“明代第一才子”的杨慎。杨慎（1488—1559年），字用修，号升庵，新都（今属四川）人，明代文学家、史学家、方志学家，一生博学多识，在许多领域有开创性的贡献，《明史》一百九十二卷列传的第八十卷中有关于他的记载。

杨慎出身书香门第，其父是明代正德七年（1512年）出任内阁首辅的杨廷和。杨慎少年时聪颖过人，善诗文，12岁时曾模仿古人作《吊古战场文》，世人皆惊叹于他的才华。稍长，入京城后作《黄叶诗》，为当时的内阁首辅李东阳所赞赏，李东阳让他在自己门下学习。正德六年（1511年），殿试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其后，参与编修《武宗实录》，他禀性刚直，每事必秉笔直书。明世宗嘉靖皇帝继位后，他任经筵讲官。嘉靖三年（1524年），众大臣因参与讨论嘉靖皇帝的生父封尊号，涉案“大礼议”事件，违背皇帝意愿，皆受廷杖。杨慎祸牵其中，先受廷杖，后又被谪戍云南永昌卫，居云南30多年，后死于戍地。嘉靖之后的几个皇帝都为他平反，先后追赠或追谥他。

诗歌兼备众体。《明史》记载，“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杨慎现存诗约2300首，数量众多，所写的内容极为广泛，风格因时因境而变。一是早期风格华美的诗歌。杨慎出身于钟鸣鼎食之家，家学渊源深厚。他自幼诵读诗篇，又加之天资聪颖，早就展露出创作才华。担任翰林院修撰后，他得以饱览群书，并结识众多饱学之士，在优渥的环境中创作了大量华美的诗歌。如《过渭城送别诗》《霜叶赋》，这些早期作品“天然无寒俭之气”，注重追求文辞的华美。二是反映山水自然的诗歌。杨慎谪守边陲后，远离朝堂争斗，生活在宁静的乡间，使他有时间接近自然，书写以自然风光为主题的诗歌。如在《海风行》中，他写大理的风：“苍山峡束沧江口，天梁中贯晴雷吼。中有不断之长风，冲波动林沙石走。”三是晚年抒发壮志未酬的悲情诗歌。杨慎居滇30多年，晚年创作的思乡、怀归与忧愤之诗较多，如《宿金沙江》：“岂意飘零瘴海头，嘉陵回首转悠悠。”《赋得千山红树图送杨茂之》：“白首遐荒老未还，流波落木惨离颜。”又如，他临终前所作《六月十四日病中感怀》（《七十行戍稿》）：“七十余生已白头，明明律例许归休。归休已作巴江叟，重到翻为滇海囚。”叙述自己因病归蜀，途中却被追回的憾恨，深为感人。

词作大气磅礴。杨慎的词多以大气磅礴为特征。他写的一首词《临江仙》，被后人作为《三国演义》的开篇词，可谓波澜壮阔、气壮山河。“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这是一首说秦汉历史的词，在词中他借叙述历史兴亡抒发人生感慨，豪放中有含蓄、高亢中有深沉。从全词看，基调慷慨悲壮，意味无穷，令人读来荡气回肠，在心头平添万千思绪，体会到大彻大悟后的感慨。杨慎的词得到后人高度评价，明代诗人周适在《刻词品序》中称他为“当代词宗”。

品词开创先河。杨慎不仅善作词，也善品词，他著有专著《词品》，该书论说与评词，穷本溯源，直至梁陈隋和六朝。他在《词品》的序文中说：“诗词同工而异曲，共源而分派。在六朝，若陶弘景之《寒夜怨》、梁武帝之《江南弄》、陆琼之《饮酒乐》、隋炀帝之《望江南》，填词之体已具矣。若唐人之七言律即填词之《端鸿鸪》也。七言律之仄韵，即填词之《玉楼春》也。若韦应物之《三台曲》《调笑令》，刘禹锡之《竹枝词》《浪淘沙》，新声迭出。孟蜀之《花间》、南唐之《兰畹》，则其体大备矣。岂非共源同乎？”除隋、唐、宋词人及其作品介绍和论说外，《词品》也涉及金、元、明的词人及其作品，对后代影响深远。

方志著作等身。杨慎在云南多年，对云南的整个地理环境都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对不同地域的气候差别、相同地方的古今气候差别都进行了详细考察和深入研究，历尽千辛万苦，专门编纂出《滇程

杨慎：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 甘根华

记》《云南山川志》《南中志》等地方志书。这些著述有不少独到之见，或可补史阙，或提供线索，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例如，在大理时，他为了研究大理历史，经多方寻访，才找到《白古通记》，但这本书是古白文的秘籍，他无法看懂，就虚心向白族人请教，经过刻苦钻研，终于弄通了古白文。接着，他又认真对《白古通记》进行翻译和整理，并参校汉文史籍，编写出《滇载记》这一部统记滇域原始及各部姓种类、较为系统的民族史志，被后世誉为是填补了民族史志空白的志书。据史料记载，嘉靖年间杨慎曾主持修过云南省志。明代简绍芳等人编纂的《杨文宪公升庵先生年谱》载：“嘉靖十一年（1532年）壬辰正月，布政高公韶（即布政高韶）聘（杨慎）修《云南通志》，馆于滇之武侯祠。时聊大夫有欲冒嗣颍川侯傅友德以觊世爵者，公不可……公遂去。”杨慎此次修志虽未竣工，但留下的未完成书稿，为后来李元阳编纂《云南通志》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杨慎的著作主要收入后人编订的《升庵集》中。此外，他的词、散曲、弹词另辑有《升庵长短句》3卷，《陶情乐府》4卷，《二十一史弹词》12卷等。著名的《四库全书》中收录他的著作34种，内容涵盖经部、史学、子部、集部。杨慎虽然才华横溢，但一生饱受磨难。他为人正直，不容于朝廷和权臣，屡遭贬谪，被放逐滇南30多年，最后病逝于戍所，终生不得归。仕途的坎坷、环境的险恶，没有使他消极颓废，他始终坚持正道直行、坚守人格风范，或寄情山水以诗词歌赋咏怀言志，或研究经学、方志文献并悉心著述，在文学、史学等领域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给后世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和精神财富。历经沧桑然不改初衷，穷且益坚而著作等身，“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既是杨慎对历史时空变幻发出的感叹，也是他旷达人生的真实写照！

